

第十二章

相關史實與傳聞



飛將軍 蔣鼎文



撰寫蔣鼎文的傳記，自是閱讀了大量與他相關的文獻史料。這些資料雖為當時兩個陣營或中間立場之人所寫，然不少為當事人和親歷者以及學者親炙，因而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我在落筆為文、核實援引時，卻發現一些著名文獻有些錯失，因而順帶寫下，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還有與蔣鼎文長相跟隨或生活在一起的直接知情人士提供了一些資料，他們說晚年的蔣鼎文在茶餘飯後不經意間透露了當年相關秘聞。這些轉述既珍貴且具重要參考價值，然因尚未找到相應文獻資料作佐證，故而暫且以傳聞的形式寫下來。

如將這類札記或傳聞插入本書相關章節，體例或有不當，考慮到所述內容與蔣鼎文緊密相關，乾脆匯成專章，作為本傳記的一個部分，大概亦不太脫離主題。

一、蔣鼎文的生年

蔣鼎文的卒年無分歧，然其生年歧說紛呈。

第一種說法，為光緒二十年農曆甲午十二月三十日，換算成西曆是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二種說法，為光緒癸巳十九年出生，然未說明出生月日，換算成西曆為一八九三年，也有可能為一八九四年；第三種說法為一八九四年；第四種說法為一八九六年。

第一種說法為傳統主流的說法，一般史籍多採此。

第二種說法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以後開始出現，源自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發的《口述歷史》第九期的《蔣鼎文先生訪問紀錄》。該文由李毓澍訪問，周道瞻記錄，訪談地點在臺北蔣鼎文公館，訪談時間為一九六四年五月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此「訪問記錄」沉澱了較長時間，在發

刊時，蔣鼎文已逝世（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年多了。由於對傳主本人訪問的權威性，所以近來中國大陸一些重要書籍開始陸續採用一八九三出生之說，如李躍乾編著的《民國軍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二頁，在介紹蔣鼎文時就作如是之說，並有漸漸擴散的趨勢。

寫蔣鼎文的傳記，生年是起點，如果這點不能確定，其他就無從談起。

筆者首先找到了一九三五年修成刊行的諸暨盤山《蔣氏宗譜》行傳卷二六，《蔣氏宗譜》載：「睢，三百一，名鼎文，字寶篆，號銘三，浙江講武堂畢業……生於光緒二十年甲午十二月三十日午時。」蔣鼎文及其弟弟蔣鼎五係「睢」字輩，該宗譜對蔣氏同輩的眾多同宗子弟逐個排序記述，包括第字輩分等。倘把其中的某一蔣姓子弟出生時間序列搞亂，則一亂百亂，同輩的次序全都亂套，故而須逐個對號核實，《宗譜》所載的出生年月徵信度較高。

其二，陝西省政府民國檔案，蔣鼎文一九三八年七月出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官方對其生平作了介紹，生年亦為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那麼被訪談者難道對自己的出生年月也會搞錯嗎？一般來說不大可能。這裡可能有複雜情況，即整理成文時是否送蔣鼎文本人寓目審定不得而知。因為此文正式發刊時蔣鼎文已逝世多年，而離訪談時間更是長達三十五年。

問題也有可能出在對蔣鼎文的生日換算上，因為蔣出生在農曆除夕大年三十之日，按照江浙一帶的傳統演算法，這一天時間就算一歲，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一（春節），就是兩歲了。如果換算時沒有去考慮農曆、西曆、清朝紀年交叉的因素，一來一去就相差一年了，這是所誤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蔣鼎文常常口頭自說「生於民前十八年」，換算時僅注意到「民前十八年」句，

而忽視「甲午」兩字，這就極易差錯。

其三，筆者又查找到蔣鼎文六十壽辰、七十壽辰的慶賀時間和書面資料，李家鼎留下蔣的六十壽辰序文，時為一九五四年二月，內有「生於民前十八年甲午」之句，甲午之年為一八九四年，然其生日為農曆甲午年十二月三十日，這就是公曆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了；何應欽、顧祝同等三十五名資深將領為蔣鼎文七十壽辰作序，時間為一九六四年，按照南方人「做壽逢九」（虛歲）的傳統習慣（如蔣介石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洛陽祝五十歲壽辰，蔣生於一八八七年十月），則不難推算，蔣鼎文的出生年月是一八九五年一月。

其四，為慎重，筆者再向蔣鼎文後人徵詢蔣鼎文的生肖屬相，蔣的後人明確告知：「屬馬。」屬馬是農曆甲午光緒二十年，而蔣的生日是光緒三十年這一天，均無異說，故屬相為「馬」，加之出生之日，換算成西曆則是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如此可以確定無疑，蔣鼎文的出生年月日為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其實，該期《口述歷史》編發「訪問紀錄」時亦有疑慮，蔣鼎文的出生年月不應是「訪談」中所述的一八九三年，故特在文末附錄《蔣鼎文將軍傳略》（第八五頁）中加了編者按語：「蔣鼎文先生，字銘三。清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生，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二日於臺北病逝」。只不過他們對原始出處和導致差錯的原因未予進一步考究追溯罷了。

《訪問紀錄》除蔣鼎文生日以外，還有一些差錯，另文撰述。

二、《蔣鼎文先生訪問紀錄》拾誤

《蔣鼎文先生訪問紀錄》（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一九九九年六月出版）是一篇歷史價值較高的文獻資料，訪問者李毓澍先生，記錄者周道瞻先生，訪談時間為一九六四年五月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歷時一年半有餘，可見無論是訪問、記錄者還是受訪者本人都花了精力、心血、時間，值得尊重。也許是整理成稿時有說不清、聽不明和其他原因如方言等所致，文中有一些小小誤差，擇錄如下。

一、蔣鼎文先生的生年應是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而不是一八九三年，對這，已有關於蔣鼎文的生年考證筭記形成，此不重複。

二、該期第三頁開頭：「諸暨縣，清代屬於紹興府，一府兩縣，另一個便是嵊縣。」諸暨、嵊縣（今嵊州）原屬於紹興府沒錯，然紹興府卻有「一府八縣」，即：山陰、會稽、諸暨、蕭山、嵊縣、新昌、上虞、餘姚，紹興府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府兩縣」的歷史。

三、第八頁倒數第五行：王文慶與童葆暄是「海寧縣的小同鄉」，王文慶是浙江臨海人，屬台州；而海寧則是浙江嘉興所屬。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蔣鼎文與郭廷以（右）合影

四、第二五頁第三行：「杜思聰作戰不力，依軍法應撤職處分，杜思聰的二十二師……」，此處「杜思聰」應為「涂思宗」。

五、第二九頁倒數第七行：「我當時的番號是新編第三軍」，中原大戰的第三軍的番號是否存在，迄今未查到，是否會是「第二軍」，尚待考。

六、第三三頁倒數第三行：「（民國）十九年七月間……接到家中電報，知道父親去世的噩耗。」查一九三五年印行《蔣氏宗譜》卷四，內有蔣鼎文所撰《先嚴子朗府君行述》，其父逝世為九月十一日，當是七月份重病不起至九月份逝世。

七、第四〇頁倒數第三行：「民國二十三年二三月間，陳辭修率領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三個師在江西進剿，沒有多久便全部斷送了。」此當指第四次「圍剿」之事，年份上「民國二十三年」應為「民國二十二年」；所率三個師的序列為「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師」；一說為「第十一師」加其他兩個師。

八、第四二頁倒數第五行：「（民國）二十二年元月就佔領了福州，把閩變解決。」應為民國二十三年，因為在「二十二年元月」，「閩變」之事還沒有發生。

九第五九頁倒數第六行：「（民國）三十年調西安辦公廳主任，同年調一戰區司令長官……」，不是同年，而是次年一月十二日出任此職。

十、第六一頁倒數第十二行：「勝利前夕，中央內定我去東北的。傅作義在重慶就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這裡的「第九」應為第十二戰區。

十一、第六三頁倒數第七行：「我在諸暨西施店——也就是西施故里——找到一塊地皮。」「西

施店」應為「西施殿」，為紀念西施而建造的古跡，至遲在唐朝以前就存在，而「西施店」就變成物品買賣的店鋪了，二者大相逕庭。

以上也許是或記憶、或誤記、或整理、或校對等原因導致，這些許微瑕不影響這塊「白璧」的價值，因看到了，順便綴而成文，以供修訂時參考。

三、毛澤東的修改與黃仁宇的疏忽

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對國共兩軍圍剿與反圍剿的歷史素有研究，他在所著的《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對比了國共雙方對當時戰事的記錄，並作出分析和邏輯推理。他說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對第三次圍剿之記述，與「國民黨軍隊的記錄有很大的出入」。在這裡，黃仁宇沒有直接說明與「國民黨軍隊的記錄」出入在何處，只是概略地說打十九路軍之仗是紅軍「吃了不集中的虧」；蔣軍的退師並非「饑疲沮喪，無能為力」，而是南方組織的反蔣政府興師北伐，於是蔣抽掉各部去堵截。其後，復有日軍佔領瀋陽之「九一八」事變發生云云。

黃仁宇轉引了臺灣學者郭廷以對第三次圍剿的記述：「兵力約二十二萬人，參加戰鬥的約十三萬人，半數為中央軍，並出動空軍，蔣躬自督戰，十餘日間以雷霆萬鈞之力，急進猛攻，連克要城，深入蘇維埃區，宣稱十天之內可盡收復失地，肅清散匪。」及提到戰役之結束則云：「國民黨軍隊主力自江西西調，紅軍跟蹤攻擊，為蔡廷鍇軍所敗，損失頗巨。此為圍剿以來的一大勝利，可見得紅軍並非特強，時蔣的注意力集於粵、桂軍，放鬆了紅軍，因九月十八日日軍之突襲瀋陽，更無法再對紅軍進攻，第三次圍剿完全停止。否則紅軍局於南北東西不及二百里的山區，久戰久疲，不僅

不能乘勝追擊，以其有限的物力人力，如果戰事持續，最後勝負正不易言，所以中共對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並不特別強調。」

黃仁宇還記敘道：「毛澤東在《戰略問題》裡面敘及：『我又乘其退卻打了蔣光鼐、蔡廷鍇、蔣鼎文、韓德勤，消滅蔣鼎文一個師。對蔣光鼐、蔡廷鍇兩師，則打成對峙，讓其逃去了。』」顯然，黃仁宇是加了直接引號的，所引為毛澤東的原文。

看到這段直接引文，感覺有點不對勁，在第三次圍剿時，蔣鼎文雖任第四軍團總指揮，可其老營盤、黃土坳之戰遭到紅軍黃公略等部突襲的是第九師一個旅而已，且受襲的是第九師新成立的獨立旅，此旅「從唐生智部隊改編過來的，戰鬥力比較薄弱」（見《蔣鼎文訪談錄》，載臺北《口述歷史》第九期），為中原大戰結束後剛剛設編成立的新軍，並非第九師整個師。如果說是「消滅蔣鼎文一個師」，則第九師所有的軍事行動便告終止，故黃仁宇所引毛澤東「消滅蔣鼎文一個師」之說，從歷史角度看，並非符合事實。

是什麼原因導致？

查核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黃所引語在二一九至二二〇頁之間）一文，兩者之間，果然有出入。該版的毛澤東文是這樣敘述的：「我又乘其退卻打了蔣光鼐、蔡廷鍇、蔣鼎文、韓德勤，消滅蔣鼎文一個旅，韓德勤一個師。對蔣光鼐、蔡廷鍇兩師，則打成對峙，讓其逃去了。」

黃仁宇書直引毛澤東文是：「消滅蔣鼎文一個師」；現見到毛澤東的原文則是「消滅蔣鼎文一個旅，韓德勤一個師」；兩者同為毛澤東之文，然事實差異不小。

可能有兩種原因導致：

第一，黃仁宇引毛澤東「消滅蔣鼎文一個師」之說，或其時韓德勤之師歸屬蔣鼎文直接指揮，約略地說「消滅蔣鼎文一個師」大致亦可；或是紅軍在擊潰蔣鼎文第九師獨立旅的戰果彙報中，有可能籠統說成是「消滅蔣鼎文的一個師」，故而出現了黃仁宇書所引毛澤東文章中的這種提法。

現在所能見到《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版的說法，與歷史事實符合一些。

第二，版本不同，然對不同版本之間的異同，《毛澤東選集》的編輯者只對「注釋」的修改有所說明，至於毛澤東對「正文」有什麼修改則未作交代說明。查閱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對《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的出版說明：「《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的修訂工作，主要是校訂注釋，改正注釋中某些錯訛的史實和不準確的提法，增補一些新的注釋，刪去少量的注釋。注釋校訂工作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從一九六二年起著手進行的……」

《毛澤東選集》卷一的「注釋」中，確把毛澤東原文中，將「蔡廷鍔、戴戟、韓德勤」的軍隊序列誤寫成「蔣光鼐、蔡廷鍔、韓德勤」，以作「注釋的形式」作了更正，但對「正文」的修改，諸如將「消滅蔣鼎文一個師」，修改成「消滅蔣鼎文一個旅，韓德勤一個師」等史實更正，就再沒有文字說明，這是否為尊者諱之故？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末，還附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七月第一版與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的「正文」校訂表，計有三十六處改動，也即第一、第二這兩個版本「正文」有哪些不同之處；但這兩個版本均未提及對《毛澤東選集》卷一《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原文作過何種「校訂」或「修正」的說明，又不知何故。

黃仁宇為嚴謹的歷史學家，可他《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引用毛澤東名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時，竟然沒有注明版次和出處，從而導致兩者史實差異，引起讀者不必要的紊亂，是這位嚴謹學者的小小失慮？還是其他呢？

四、《周恩來年譜》一處失誤所本

《周恩來年譜》第三四二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第一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張學良陪蔣介石到洛陽，致電楊虎城，要楊照蔣意釋放衛立煌、陳誠、蔣鼎文、陳調元等四人……次日……全部釋放被扣押的高級官員。」這裡的敘述與歷史事實有些不相符。

這種說法出處可能來源於西安事變經歷者、後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申伯純的著作《西安事變紀實》之中。

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初版，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第二版）第一六二頁第八行：「他（蔣介石）一到洛陽（二十五日），馬上就寫了一個手諭給張學良，要張立即拍電報給楊虎城，立即釋放衛立煌、陳誠、蔣鼎文、陳調元四個人和幾十架被扣的新式戰鬥機。」

蔣介石是否下過「手諭」，未考，然說「手諭」中包括蔣鼎文，則誤。蔣介石從西安抵達洛陽已是二十五日傍晚，至於蔣鼎文到達洛陽的時間比蔣介石早一天，他是二十四日持蔣介石停戰手令抵洛陽，讓國民黨軍隊前線停火的。這在蔣鼎文、宋子文、何應欽、周恩來等相關電文中多次提及，用不著在這裡引經據典佐證。而《周恩來年譜》這樣莊重的著作，亦未過多核實，卻蹈襲這種個人

回憶錄中不太正確的說法。

該書還有史實錯誤，一二一頁第八行：「當天（十二日）晚上他們（指被扣西安中央大員）還暫時被安置在西京招待所過宿，第二天（十三日）才被分別送到玄鳳橋等幾個地方『優待』了起來。」西安事變的許多史料已經證實，被扣的這批中央大員從西京招待所移至玄鳳橋等處住宿是十五日傍晚，而不是十三日這一天，至於蔣介石從新城大樓移居於高桂滋公寓則是十四日傍晚。

五、陳誠《西安事變回憶錄》若干差錯

陳誠《西安事變回憶錄》（一作《西安事變紀事》）為西安事變結束未久整理成文的。筆者粗看相關章節，認為有兩點失誤是明顯的。

一、把蔣介石在洛陽避五十壽辰時間搞錯，說成了一九三五年十月。「回憶錄」引言第（四）點在時間表述上有清楚的說明，即把一九三六年定為「今年」，把一九三五年定為「去年」，該節開頭是這樣敘述的：

去年十月十八日，余至南京，晉謁委座……幸而是月三十一日為委座五十壽辰，委座立意避壽，於二十九日離開臨潼，移駐洛陽軍官分校，余亦於是日離陝前往。

或許為免讀者誤解，在該第（四）節末陳誠再次重述本節所說之事的時間：「以上為去年（一九三五年，作者注），冬季第一次入陝前後之事。」

一九三五年十月，蔣介石不在洛陽，虛歲亦不到五十歲，自然談不上「避壽」一說。蔣介石五十虛歲避壽於洛陽，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對這看看蔣介石本人的日記及相關年譜就可坐實。顯然「回憶錄」時間表述或記憶有誤。

二、相關重要節點時間無端提前。

「回憶錄」的「紀事」部分從十二月十二日開始按日紀事，對十二月十四日這一天，陳誠作如此記述：

十二月十四日，今日張（學良）來招待所，頗現猶豫之色……余謂百里、雨岩諸先生，未有直接關係，不可請其回京設法乎？張答此須開會討論，非我一人所能決定，繼稱子文、墨三（顧祝同）若能來此，則可請銘三（蔣鼎文）回京一行。

陳誠說，張學良是這一日告訴他：如果子文、墨三來，則可請銘三飛赴南京。這裡將時間提早了二至三天。從西安事變發生的事實看，在十四日這一天，還沒有涉及到以上三人。

「子文、墨三赴陝之議」由來是這樣的。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端納在洛陽給宋美齡打電話，在告知蔣介石安全的情況下，亦向宋美齡轉告張學良的要求。對此，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如此記述：「張（學良）盼余入西安，亦盼孔（祥熙）部長同行，彼與其部下，對余推崇備至云云。」

宋美齡與孔祥熙等作了商量，所以到了十五日晚上宋給端納覆電。宋是如此敘述的：「是晚（十五日），余又以長途電話告端納，孔部長因醫生堅囑，不令飛陝；況孔為代理行政院長，勢難離職。因囑端納徵求對方意見，可否以宋子文或顧祝同代之。」

十六日端納從洛陽飛返西安，同時將宋美齡以「宋或顧替代孔赴西安」的意見告知張學良。宋美齡繼續述說道：「是晚（十六日），接端納來電，稱已抵西安，向委員長及張學良轉達我電話中之意見，今西安將領已歡迎子文與顧祝同之入陝矣。」

顯然，端納在十六日到達西安後，張學良才知道宋等提出了「以宋或顧代孔」之方案，張學良等經商量後，告訴端納同意這替代方案，於是端納在晚上再電告宋美齡的。

張學良對扣押中的陳誠是否說了這一經過，我們只能相信。但若說在十四日這一天張學良就告訴陳誠此事，則不可能，即或張對陳真的說了，時間最早也得是十七日，而不可能是十四日這一天。這一關鍵日期也可能是記憶之誤。

陳誠是頗具歷史感的政治人物，在蔣介石寫了《西安半月記》後，陳誠就亦步亦趨，也請人捉刀，旋之寫出本篇《西安事變回憶錄》，文長一萬四千字左右，敘述他在危急階段的「先見之明」、「僕僕風塵」、「忠心耿耿」、「堅貞不屈」、「地位重要」等等。然回顧當時的陳誠，他不是蔣鼎文，力勸張學良談判議和；不是蔣百里，為解決事變獻計獻策；也不是宋子文東奔西走，上下斡旋；更不像孔祥熙、何應欽處在風口浪尖上，須處理平衡各種十分棘手的關係。稍稍梳理即可知，這個時候陳誠與朱紹良是關押於斗室的待決之囚，事變解決之前，未獲人身自由，不可寸步出於室外。在一九三六年這一年中，他任職多變，至十二月，蔣介石才任命他為參謀總長下屬的軍政部次長，為

實職中將加上將銜，尚不是後來聲名顯赫的陳誠。可就是這樣的境況和地位，在西安事變餘波依然蕩漾之時，他竟物色筆桿子亦文亦飾。一個在西安事變中困於斗室，且未有作為的陳誠，竟成事變前的「諸葛亮」，事變中的英雄，事變後的功臣。這當中一切的一切，是陳誠的深謀遠慮，是他蘊藏著政治家的因數，是他具備濃重的歷史感所致。對這，同處一室的朱紹良如有所知，大概會喟然長歎。

西安事變的主要當事人，除蔣介石、宋美齡夫婦以外，如宋子文、蔣鼎文、孔祥熙、何應欽乃至張學良、楊虎城都沒像陳誠那樣用洋洋灑灑的文字來「青史留名」；稍微瞭解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上述幾人才是西安事變解決的關鍵性人物，這遠非陳誠可比擬，如將他們身歷繁複之事換成陳誠，那他保不准會寫出什麼諸多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的故事來。

推開來講，陳誠對平生每個階段都有詳細的記述，內中重點當然是他個人處事如何如何，且不厭其煩。客觀地說，應當佩服他的勤奮和勉力，也要正視他在特定階段所起的歷史作用，他所留下的宏篇鉅制可謂亦功亦罪，亦是亦非，亦真亦幻。後人面對這些海量文字，當要結合複雜的背景作具體的歷史分析和辨識，例如陳誠本篇《西安事變回憶錄》所述與其實際地位和作用相較，就不太一致，管中窺豹，或對其所存世的幾百萬文字可予鏡鑑和參照。

六、斯諾《西行漫記》誤植西安事變節點

美國名記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著有《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該書為董樂山所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出了第一版。

該書第十二篇《又是白色世界》中記述有失誤。

該書第三七七頁云：「端納於十五日回洛陽，打電話向南京提出報告。蔣介石還活著，受到很好的待遇。他還傳出話來說，蔣介石派了蔣鼎文將軍（他的被俘幕僚之一）帶了一封親筆信給南京的軍政部和政府。」

說端納在十五日傳出話來，蔣介石將派蔣鼎文持親筆信至南京，顯係提前了時間。派蔣鼎文去南京是十六日下午張學良、蔣百里、蔣鼎文三人商定的，而蔣介石致南京的親筆信是十七日上午才寫就的。這有西安事變眾多檔案資料所證實。

該書第三七八頁云：「同宋子文飛西安的還有顧祝同將軍，他是除了何應欽軍政部長以外的南京將領中沒有在政變中被俘的唯一重要將領。」

張學良邀宋子文或顧祝同飛西安談判曾有過動議，可顧祝同實際上沒有飛赴西安。從下文看，該處是指二十日宋子文飛西安的那一次，這次隨宋子文飛赴西安的是郭增愷，而非顧祝同。

郭增愷因與楊虎城私誼深厚，由宋子文向軍統監獄「借出」，於十九日下午從南京起飛，中經洛陽，二十日上午到達西安的。此事宋子文秘書陳康齊《西安事變日誌》有載。顯然，斯諾先生在這裡是「郭冠顧戴」了。

《西行漫記》是一本名著，還會一版再版，再版之時可否將上述誤植以「注釋」的形式說明，免得誤導不太瞭解這段歷史的讀者。

七、宋文梅的相關誤記

宋文梅為楊虎城十七路軍的幹將和親信，是西安事變的參與者，特別是宋文梅為實戰第一線的執行者，西京招待所所住的中央來陝軍政大員就是他率領特務營武裝扣押，然後的回憶文章也有些誤記。

宋文梅《我所經歷的西安事變》（見《西安事變親歷記》）提到：「我們將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廳內，並立即進行查點。當時查到的有：陳調元、衛立煌、蔣鼎文、蔣作賓、朱紹良、蔣鋤歐（國民黨政府鐵甲車司令）、蔣伯誠（國民黨中央委員）、陳繼承、蔣百里、薩鎮冰、張沖。」說蔣伯誠亦在被扣的中央大員中，其原始出處大概源此，以後有些書籍中出現蔣伯誠之名也據此派生。

檢索被扣西安大員的眾多回憶文章及當時報刊報導，還有臺灣的相關資料，均未再提到蔣伯誠。一般來說，對像蔣伯誠這樣有影響的軍政要人是不會疏忽記載的。再從十二月十八日蔣鼎文飛抵南京，何應欽派蔣伯誠到飛機場接機這一事實來推斷，宋文梅回憶西安事變「蔣伯誠也被扣」有可能搞錯了。

八、蔣鼎文、張學良聯手接收東北之說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末期，筆者在訪問國民黨將領劉釗銘先生時，他多次提到蔣鼎文與張學良關係友善及蔣介石原擬派蔣、張二人聯手接收東北之事云云。劉釗銘曾任西安第七分校教育處少將處

長，是胡宗南手下的得力幹將，又是蔣鼎文的親信、部屬、同鄉，二人關係密切。當時，我希望他將所瞭解的這一情況寫出來，他似乎有些顧忌，後也沒有看到他形成相關文章。

不意這次在臺灣卻看到了這方面的文章。

一九四四年秋冬之交，蔣介石召見蔣鼎文，磋商抗日戰事布局，然後對蔣鼎文說：「銘三，我要你馬上到貴陽去，去與張學良商談，並告知盟軍在沿海登陸後，派你為東北陸軍總司令，張學良擔任副司令，協助你。」

蔣鼎文乃趕赴貴陽，告知來意，張、蔣二人傾心長談。張學良說：「銘三兄，你放心，我自信東北父老對我有信心，還有學詩在那邊握有兵權。你去，我一定幫你，他人去，我不幹。」

其後，蔣鼎文又奉命去找了傅作義連同行動，讓傅作義軍從綏遠進入熱河，再攻占東北。不料，蘇聯紅軍揮師進入東北，美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日本很快投降，抗戰的勝利比設想還來得快。蔣介石根據蘇聯紅軍入關的政治生態變化，不再啟用蔣鼎文、張學良聯手的策略。

這一文章為公開發表，作者蔣干城的身分值得重視，他是一位書畫家，是蔣鼎文的族侄。赴臺以後，蔣干城與蔣鼎文聯繫密切，往來頻繁，他為此寫出了不少有關蔣鼎文往事的文章。

如果以上情況屬實，則說明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想重新起用張學良，而且煞費苦心派蔣鼎文再去作搭檔。

為此尋找其他參證。

首先，向蔣鼎文小兒媳、現在臺灣的著名企業家程伶輝求證，問她是否聽說此事。她言之鑿鑿，說此事屬實。她說公公在家裡經常講，如果當年他與張學良聯手接收東北成行，那一定不會有熊式

輝的亂象，也不會有「殺陳誠，謝國人」的民憤。蔣鼎文還說，委員長的心機深不可測，當現實需要時，要放張學良任職，當形勢轉化時，又把張學良終身囚禁。這種反差如天地的處理方式，蔣鼎文感到不可理解。程伶輝說，公公常常念叨他對不住漢卿。

其次，蔣鼎文在抗戰勝利前夕與傳作義碰面洽談，這在傳作義傳略中已得到印證，與張學良之事，蔣鼎文在「訪談」中也有提及。蔣鼎文是這樣說的：

勝利前夕，中央內定我去東北。傳作義在重慶就任第（九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就職典禮時，中央派我去監誓，委員長告訴傳作義說：「宜生，必要時，蔣銘三要用武力收復東北，你要支援他。」關外的人士如莫柳忱，甚至連張漢卿都對我很有好感，說我識大體，能與我相處融洽。

應該說蔣鼎文本人也間接點到了此事，而且點出了二人會「相處融洽」的，只不過話語沒有像蔣干城這樣直白，這是什麼原因呢？

九、再次拒任參謀總長

蔣介石讓蔣鼎文出任東南點編委員會主任時，副主任是海、陸、空、後總司令，分別是桂永清、湯恩伯、周至柔、郭懺。當時周至柔就對蔣鼎文說：蔣長官，點編主任是個吃力不討好的位子，您把人家吃空餉的氣泡擠掉了，把人家的編制整沒了，把有關係的官職給削去了，在這非常時期，會有許多人記仇於您的。蔣鼎文說，國家落難於此，既然委員長交代，我又應承了，就儘量把這個事

情做好。果然，說情的人紛至遡來，一時之間，蔣鼎文之處又戶限為穿。

事實上點編主任已粗具參謀總長職權，因為下面有「陸、海、空、後」四個總司令聽從調遣，所以甫到臺灣，蔣介石就要蔣鼎文正式出任參謀總長，蔣鼎文以各種理由婉拒；蔣介石再讓他考慮國防部長一職，蔣鼎文依然以力不勝任為由，更不願在陳誠的內閣裡就職。在部隊裡，國防部長雖是分管軍事的內閣成員，但軍隊的調遣指揮須通過參謀總長下令，故而軍隊實權掌握在參謀總長手上。蔣介石只得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中旬分任周至柔為參謀總長，郭寄嶠代任國防部長。私下裡，蔣鼎文對親友說，國家搞成這個樣子，我還當什麼鳥官。

蔣鼎文除對前途心如死灰外，他一直耿耿於懷的還是蔣介石說話不算數。西安事變時蔣介石在蔣鼎文面前說，只要漢卿承認錯誤，他就既往不咎。蔣鼎文據蔣的旨意，在西安當時那種特殊的氣氛中，是第一個力勸張學良認錯改正的人，並擔保說不會有什麼後果，是委員長親口對他說，只要漢卿改過，決不會秋後算帳。結果天下都知，事與言違，而蔣鼎文這個當事人和擔保人一直難以釋懷。如果說在大陸時，蔣介石還要顧忌東北軍人擁張學良成勢，那麼到臺灣後，張已經是手無寸兵，囊無餘錢，還有必要繼續囚禁他嗎？這個心結蔣鼎文至死也沒解開，越到晚年念叨越多，反反覆覆說他對不住張漢卿。

十、蔣鼎文怒斥宋美齡

到達臺灣後不久，蔣鼎文與宋美齡發生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激烈衝突。原來宋美齡一度積極推薦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而時任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蔣介石的內侄毛邦初不知道什麼原因與宋

子文發生了很大的爭吵。蔣鼎文仗義執言，態度鮮明地站在毛邦初一邊，為毛邦初說話。宋美齡責怪蔣鼎文幫錯了對象，管了不該管的事。蔣鼎文頓時火冒三丈，大聲開罵：「國家搞成這個樣子，你們宋家是有很大責任的，你們還要怎樣？」把宋美齡氣得臉由紅轉青，再由青轉白。然江山畢竟易主了，所以宋美齡亦無言以對，只好自認倒楣。事後宋美齡向蔣介石告了御狀，蔣介石把蔣鼎文叫去說：「你諸暨人的牛脾氣難道不能改一改嗎？」

諸暨人的「牛脾氣」實是外強中乾，火氣來時雷霆萬鈞，然當怒吼的聲音還在空中迴蕩，心中不悅已了無蹤影。普遍來說，不大會奉承人，對於看不過去的事情忍耐力不足，要講出來，甚而會面折。這種胸中平坦無丘壑、俠義剛直掛兩肩的秉性，在傳統的官場上是無法長袖善舞的。你以誠去，彼非誠來，經常碰到。官場上乃至其他層面，許多時候的判斷邏輯是只看態度，不看事實的。其實蔣介石對於身邊的諸暨人實在太瞭解了，像宣鐵吾、周振強、馮聖法、楊步飛、陳德法、樓秉國、石祖德等都做過蔣介石的侍衛長和警衛核心最高軍官。這批人不畏艱險，衛護他安全，以結草銜環、報答君王的態度，勤勉地為他做事，其人數超過奉化籍。蔣介石看中的無非是諸暨人忠誠不二、勇敢無畏的性格和不會在後面使壞、即使滿肚心中不快也只會邊發牢騷邊把事情盡力做好的脾性。

宋美齡對蔣鼎文確也沒什麼辦法，因為他無欲無求，是個不想當官的「忠臣」，憑著他的資格和軍功，該說的話還是要說。據說一九七三年歲末蔣鼎文病危入院時，適蔣介石也住院在臺北榮民總院三樓，當得知蔣鼎文垂危呼吸困難時，蔣介石非常急迫地說：「銘三的肺只有一葉，我曉得的。」並要醫生趕快將當時全臺灣唯一從美國進口的呼吸急救機送至蔣鼎文病房，可宋美齡一時之間竟支支吾吾不置可否。